

以筆作槍

——對瞿駿同學批評的回應

• 孫 江

瞿駿同學，自從你評論拙編《事件·記憶·敘述》（「新社會史」1，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的文章在《二十一世紀》2005年6月號刊載後，我們之間的距離突然拉近了。對你關注新社會史研究，我感到高興，因為任何一個新生事物如果沒有年輕人參與，是絕對不會有希望的。通讀你的文章，可以感到你有一定的文字功夫，志向似乎也很高遠，如果你篤於學，勤於思，我相信你將來是一定能夠寫出很好的學術論著的。但是，作為一個虛長你幾歲的同行，作為你的批評文章的當事人，特別是作為一個被你誣為作偽的學人，我必須嚴肅地指出你的文章中存在的幾個嚴重問題。

第一、文風問題。你在開篇頭一段說道：「兩大本極厚黑的《新史學》」。的確，兩本黑封皮的《新史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是很厚，但是，經你這麼「厚黑」一串，味道全變了：書中三十多位不同學科的學者都被你嘲笑成了厚黑學者，三十多位不同學科的學者的努力也成了不知天高地厚之舉，你的口氣好大！你好像還是博士研究生吧，請問，這是對待師長應有的態度嗎？

你接着批評拙編說，「而對不屑者、批評者來說，看不懂的新名詞、搞不清的洋理論、西化的語言系統構成了這本書的主體，按照某位書評作者的概括：新社會史就是一個辮子已剪、長袍未去的假洋鬼子」。這段話有兩層意思。一是你之所以不屑和批評此書，是因為有「看不懂的新名詞、搞不清的洋理論」云云。我很奇怪，你既然嘲笑那麼多學者「厚黑」，怎麼又甘於承認自己「看不懂」、「搞不清」呢！這不是自我矛盾嗎？從你的語氣中可以知道，你與其說「看不懂」和「搞不清」，還不如說根本就沒有好好看，所以當然看不懂了。既然你對要評的書都「看不懂」、「搞不清」，那麼，你還有甚麼資格寫書評呢？！其實，如果你認認真真地看看拙編，捫心自問一下，裏面真的有那麼多「看不懂的新名詞、搞不清的洋理論」嗎？

二是你引用的「某位書評作者」的話，好像是馬釗先生發表在《中華讀書報》上的一篇評論拙編的書評裏的話吧。馬釗先生是個頗有見地和幽默感的學者，你借用和歪曲人家的話來嘲弄拙編的作者們，這是對待他人的學術研究應有的態度嗎？

本來，你的書評對各位作者有批評也有肯定，也不乏一些有益的意見。但是，你的幾行草率的文字在被編者摘出來掛在頁邊上後，整個文章的格調顯得輕浮而無禮。更糟糕的是，你在「不屑」心態的驅使下，作為書評作者，犯下了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竟然不加查對，就誣陷筆者文中有「偽註」。關於這個問題，我後文會專門和你討論。

第二、文理問題。你的書評由三個部分組成，如果將其作為一個「文本」來閱讀的話，既缺乏整合性，行文也不甚通暢，似乎可以將其視為兩、三個文本的拼湊。在第一個文本裏，也就是第一部分裏，你說拙編「初步到位」。實際上，你的評論根本沒有「到位」。從你在開頭提到的「厚黑」書和文末提到拙編「後記」的內容來看，我確信，對於《事件·記憶·敘述》的代序和收在《新史學》裏的我的論文之間的關係，你是搞得清的。可你硬要將我早先發表在《新史學》一書裏的論文作為統攝拙編的綱領，還把我個人關於新社會史的三點看法強加給其他作者，這種做法能說「到位」嗎？

你說拙編只能得到「初步到位」的評價，是指書中一些文章「學術規範」和「史料運用」還沒有「到位」。你重視「學術規範」和「史料運用」問題，這很好，但你的評論卻極不「到位」。何以言之？看看你是如何批評他人的吧。

你批評王冠華的論文「學術史回顧」不到位，並列舉了幾篇作者文中沒有提到的論文來證明。王冠華是一位出色的留美華人學者，他的相關著作 (*In Search of Justice: The 1905-1906 Chinese Anti-American Boycott*) 也早在2001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你指出來的問題很重要，作為編者，我應該標出作者的寫作時間。這是我的失誤。但是，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你在

文中既然開列了1997年《歷史研究》發表的幾篇同類研究，當然不會不知道王文曾發表在1999年《歷史研究》第1期上，你為甚麼對此按下不表，而佯裝不知「具體寫作時間」呢？

接着，你指責上田信、田海 (Barend J. ter Haar) 和我的論文「缺少應有的學術史回顧」。上田信教授是日本研究明清社會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論文〈被展示的屍體〉是一篇很有新意的論文，他通過停屍抗議 (=圖賴) 討論人類學和歷史學的方法論之不同，頗受學界的關注。你指責人家沒有「學術史回顧」，是不是找錯門了。其實，如果你認真閱讀作者的論文，不難看到，行文之中是有學術史回顧的。還有你批評的田海教授，他是荷蘭萊頓大學的漢學家，著有三本視角獨特的關於中國古代史的專著，其中關於天地會和白蓮教的兩本書的中譯本已經收入我和劉平教授共同主編的「海外中國秘密社會史研究譯叢」，很快將在國內出版。這次收入拙編中〈重新思考中國文化中的「暴力」〉是田海教授的一篇評論性論文，文中批評了歐美漢學傳統中有關中國文化「文」的話語。你指責人家沒有「原始史料」，是不是進了米店，問人要水稻！而且，你說作者文中「竟然沒有引用一篇中文的原始文獻」，真的嗎？請你仔細看看，不會「看不懂」的。

至於你對拙文的評價也存在類似問題。你一共對拙文提出了三條批評意見。關於第一點致命的「偽註」問題，我將在後文予以批駁；關於第二點，中國傳統社會究竟是以「血緣」、還是以「骨肉」來想像自身的？這是拙文提出的一個問題，希望借此喚起學界的注意，對此，你似乎並不關心，而在「學術史回顧」上向拙文發難。我很懷疑你懂不懂甚麼叫「學術史回顧」。閱讀拙文，你會發現我在文中

對前人研究多有「回顧」，比如我不直接引用手邊的原始史料，而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這不是學術回顧，是甚麼？關於你的第三點批評意見，我之所以要用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兩種《左傳》文本，蓋欲突出前輩學者楊伯峻先生的先驅之勞，這不也是一種學術史回顧嗎？在學術史回顧問題上，我不認為開篇頭一段來三兩句八股文，然後在註釋裏列出一長串「菜單」，那就叫學術史回顧。有時候，這種形式上的「學術史回顧」會成為突出自己、貶低他人的道具。

第三、文德問題。本來，對於你這樣一篇連「初步到位」都夠不上的書評，我是不會費時間和你討論的，可是，你在批評我的一段文字裏，竟然誣我作偽，這讓我震驚不已。你我都是研究歷史的，你知道，這句話可是要置一位學人於死命的啊！看到你這一句話後，作為被批評者，我立刻放下雜誌，給《二十一世紀》主編去信，對其審稿能力提出質疑。為此，我和主編之間發生了深刻的意見對立，最後我決定辭去《二十一世紀》編委之職。理由呢？不妨摘一段我給主編的一封信裏的文字給你看看：

再強調一下，作者批評我編的書，這是他的自由，我非常歡迎；他對新社會史的冷嘲熱諷，我也可以不計較；但是，作者說我文中有「偽註」，豈能輕易放過！學者應該以存真去偽為己任，如果你們的編委做「偽」，那麼，你們在刊發批判他的文字之前，就應該將其掃地出門；如果你們刊發的文字不實，那麼，你們有責任公開道歉。

看了上述片斷，不知道你會作何感想。到底有沒有雍正朝修訂的《大清會典》？到底有沒有拙文引用的內容？你去查對過嗎？請按照拙編頁210註10的提示去查對一下吧。我

很吃驚，你已經是中國近代史專業的博士研究生了，居然連這樣基本的「原始史料」有沒有都「搞不懂」！不知者無罪。但更令我吃驚的是，你竟然信口雌黃：「這裏憑『雍正朝』三字即可判定其為偽註」。我從1984年起就師從南京大學歷史系蔡少卿教授研究秘密結社史，浸漬於此道凡二十餘載，你所說的「偽註」，十多年來，我從《大清會典》（雍正朝）中引用過多次（從拙編頁210註13的拙文亦可知），如果你能稍稍翻閱一下原文，從而發現我在從自己的日文著作中回譯這段文字時誤加了引號等問題的話，我肯定會感謝你的。遺憾的是，這麼一件舉手之勞的事你不去做，這也罷了，你竟敢斷言是「偽註」。問問你的老師，這是做學問應有的態度嗎？！

瞿駿同學，你在書評裏的第三個文本、也即最後「餘論」部分裏，輕狂地對拙編裏的兩位學者的研究臧否了一番後，莫名其妙地搬出余英時先生的話來嘲諷筆者。余先生的話我反覆閱讀了幾遍，感想和你說的一樣：「誠哉是論」。可是，讓我納悶的是，如果你言行一致，認真從拙編中找出「真問題」的話，那麼寫出來的文章絕對不會如此「不到位」！

《新社會史》非常歡迎年輕作者的來稿。在即將出版的第2期《身體·心性·權力》裏，我們刊載了一位博士生寫的論文〈自殺時代〉，洋洋灑灑近五萬言。瞿駿同學，希望你能認真看看自己同輩的研究，看看人家是怎樣做學問的，再從自己的文章中找出「真問題」，不要以筆作槍，隨意揮舞！

孫江 南京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博士，日本靜岡文化藝術大學副教授。從事新社會史和近代學術概念考古研究。